

系统的哲学

金观涛

著

My Philosophical Pursuit



金观涛
——
著

系统的哲学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9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系统的哲学 / 金观涛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59-1479-5

I. ①系… II. ①金… III. ①系统哲学—研究
IV. ①N94-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1450 号

XITONG DE ZHEXUE

系统的哲学

金观涛 著

出版发行: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1 号

邮政编码: 276017

开 本: 960mm × 1300mm 1/32

插 页: 4

印 张: 13.5

字 数: 348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1479-5

定 价: 7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金观涛

生于1947年，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1978年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曾任《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科学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20世纪80年代创办“走向未来”丛书；1989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担任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2008年退休后到台湾政治大学任教。

主要著作有《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与华国凡合著，1983），《系统的哲学》（1988），《历史的巨镜》（2015）。与刘青峰合作以下几本著作：《兴盛与危机》（1984），《开放中的变迁》（1993），《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2000），《观念史研究》（2008），《中国思想史十讲》（2015）。



三辉图书

选题机构 三辉图书
策划人 严搏非
出版统筹 雷戎
策划编辑 董曦阳
责任编辑 刘浩冰 郭明
特约编辑 潘梦琦 谢小谢
营销编辑 范存榜 赵娜
装帧设计 COMPUS·道辙



乐感文化官方微信



福建鹭江出版社旗舰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头：www.ertongbook.com

2018 年版序言

当搏非老友告诉我《系统的哲学》新版即将由鹭江出版社付印之时，我才不由自主地想到该书的出版和再版过程已如此漫长。本书最早是在 20 世纪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时代潮流中，我把自己的哲学思考汇集为《我的哲学探索》，1988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年，新星出版社以《系统的哲学》为书名再次出版，当时我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是在日本爱知大学黑笹校区的客座教授办公室看完该书清样的。此次再版《系统的哲学》，距最早的版本已过去 30 年了。30 年间世事变幻，该书出版的第二年，我们离开北京后长期留在香港工作，2008 年从香港退休后到台北教学，几年前再回到北京、杭州……熟悉的风景不复存在，我们好几位朋友，包括编辑本书第一版的马嵩山先生，已相继离世，令人感慨唏嘘不已。

记得 2005 年为此书写再版序时，我提到自己参与的医学方面整体自洽疗法和美术中具象表现绘画的探讨、方法论都与《系统的哲学》阐述的自耦合分析有关。至今又过去 13 年了，我们与临床医生合作的整体自洽疗法已发展为系统医学的新理念，具象表现绘画成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专业方向之一，已培养出十几个博士。我本人则将《系统的哲学》的方法与思想史、观念史结合，在中国美术学院带出几批

博士、硕士研究生，力图解释代表中国传统审美精神的山水画起源与演变以及探讨中国书法精神。也就是说，我的哲学研究从未停下来，并试图应用到不同领域。

《系统的哲学》是由《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和《整体的哲学》三部分组成。我在《人的哲学》中提出一切存在都是本征态，“客观存在”是有条件的，该观点自1987年提出后就备受争议，不断有人指责《人的哲学》提倡主观唯心论。当时量子纠缠的原理尚未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而今日对定域实在论的否定已被公认，量子纠缠正在转化为量子通信技术。面临科学发展对客观唯物论的挑战，很多人惊慌失措，甚至还有人提倡用佛学观点来调和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消融的宇宙观。而我在本书初版时，提出用自然规律和仪器的同构律来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可以用本征态的自相关即某种递归过程来破解人类的意识之谜。几年前，我用这一观点写了篇探讨什么是意识的文章，现在作为2018年新版的附录，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的基本观点。

面对科技飞速发展，哲学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以至于今天有不少人感慨“哲学已死”。但我始终认为，正在死去的不是哲学，而是千百年来束缚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那些不甚准确的哲学观念，真正的哲学探索应该用新的思路去考察古老的哲学命题。本着这一信念，这本写于30年前的《系统的哲学》，它不仅体现着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精神，而且力图把20世纪最重要的方法论遗产转化为哲学，故也可以视作为21世纪读者所写。

长期以来，我和青峰认为：任何著作一旦出版，便成为和作者无关的存在，世人关注、褒贬与否都不重要。话虽如此，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本书的出版使我们能以书会友，结识了许多年轻朋友，他们对哲学议题的热切追求和与我们的真诚友谊令我们感动不已。正因为书缘，我们结识了杜军，并在他主办的西山书院住了半年。至今我们仍

然常常想起，2012年春天在京西百花绮丽的树林里和他讨论《系统的哲学》的情景。每一个生命注定都会衰老，从盛年走向老年正是人生慢慢消失在密林中的过程。而哲学之魅力在于它可以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对思想和人生意义的追求，希望本书更年轻的新一代读者，能有更多的哲学讨论的林中路。

金观涛

2018年写于北京寓所

再版序言

该书的基本思想孕育于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于 80 年代。1988 年夏曾以《我的哲学探索》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 20 年前的有关系统论哲学的书能够重印，这本身是不寻常的。当年我之所以把系统论做新的表述，是为了寻找中国文化重建的方法论基础。我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是和刘青峰合作，提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假说；另一方面是科学哲学的研究，力图勾画一种系统的哲学，以锤炼把握社会历史研究、理解现代性的分析工具。本书可以说是第二方面工作的代表作。20 年过去了，我们仍在这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道路上上下下求索，而不知老之将至矣！

令人欣慰的是，本书并没有被历史遗忘。虽然系统论哲学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不再时尚，但是有两个方面的新进展出我意料。第一，它的某些观点被运用到艺术研究的最新领域。《人的哲学》曾提出可将真实分为主观真实和客观真实两种。主观真实只是系统论方法在认知上运用得到的一个逻辑上可能的推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存在，当时是不知道的。20 世纪 90 年代基于法国画家贾科梅蒂创作经验的具象表现绘画，主观真实第一次在绘画领域中被证明。在这艺术成为可有可无的新世纪，当发现主观真实成为画家新的使命之时，有关哲

学研究自然构成进一步探索不可缺少的工具。第二,《整体的哲学》的某些方法开始被运用到医学上,结构稳定性对内稳态的新发展终于引起医生的重视,一种被称为整体自洽的医疗理论正在兴起。

也许本书所举的一些例子已经过时,或应被更恰当的例子所取代,但再版时我只改了书的标题,在内容表述上仍保持原书的面貌,除了我相信本书的基本理念仍然正确外,还想提醒读者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想达到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旅美哲学家傅伟勋先生希望我用系统论实现价值理论的重建,我在《人的哲学》的结尾对此做了展望,但至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表面上看,《系统的哲学》只是站在系统论和20世纪科学的(事实)前沿,做出新的最基本的哲学概括;而价值系统是对“应然”的论述;“实然(事实如何)”推不出“应然(应该如何)”使得建立在系统论哲学之上的价值理论是不可能的。20年来,我一直被“实然”和“应然”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阻挡,不可能回到80年代的探索中去。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建立跨越鸿沟桥梁的基石正在本书《人的哲学》之中。

当年竭力促成我把《人的哲学》《发展的哲学》和《整体的哲学》汇成此书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马嵩山先生,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中,讲述哲学重建对青年一代的重要性。今天傅先生和马先生都已去世了,想起他们对我的期待,我常常汗颜。今借再版序言表达对他们的思念。

金观涛

2005年于香港中文大学

序言

20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我埋头于自己的沉思之中，不觉岁月流逝，窗外已过去了20个春夏秋冬。今天我依然如20年前一样在走自己艰难的“哲学”之路，耳边仍回响着青年时代激励着我的主旋律：“探索人生、寻找光明……”

我们这一代已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了。是时候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又究竟要到哪里去？

我心中的马克思：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罗曼·罗兰曾把人生比喻成那浩浩荡荡奔流着的大江，人内心世界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一开始往往如那江心岛屿在晨雾和阳光中时隐时现。整个少年时代，我和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处于“哲学麻木”状态。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从小的思维方式就是常识的、直观的。作为常识和直观经验的总概括——传统的哲学，对我没有特殊的吸引力。

狄拉克曾十分风趣地说过，自从我们把宏观的手指头伸到宏观的嘴里时起，脑子里就灌满了各式各样显而易见的常识。常识决定了一个正常人的理智，但也使人带着那个时代的一切公认的错误和偏见。人们可以拒绝讲哲学，沉睡在以常识为基础的哲学梦中是最舒服和最难被唤醒的。我的哲学意识唤起是朦胧的。初三那一年，有一次上哲学课，老师随便提到，有一位叫贝克莱的哲学家认为，石头的存在是因为你碰到了它。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当时在我的心中引起的骚动至今记忆犹新。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论断荒谬绝伦，哲学居然是用于讨论这些根本不用理睬的荒唐的哲呓（我怎么可能想到，近三十年后，我居然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再次和这一论断作战，而且走出这一哲学的魔障是何等艰苦和需要科学的勇气）。另一方面，总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不安、激动。现在我才知道这原是一种只有对哲学家才要求的无畏和深刻的怀疑精神。哲学论断可以对也可以错，可以有意义也可以没有意义，但真假哲学的试金石乃是看它是否具有思想的大无畏和深刻的彻底性。然而，毕竟我还太年轻，哲学第一次来敲我内心的门时并没有把我从麻木中唤醒。在中学时期，我的整个兴趣都转到自然科学中去了。

其实，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如果不是内心的体验，那么所谓的理论思考和中学生的寻章摘句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你只是去吸收被别人咀嚼过的思想中流出的汁液。哲学的启蒙要求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它，它要求理论家不仅用哲学来研究生活，而且要用生活来写哲学。而在“文革”以前，要我们这一代人做到这一点甚为困难。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强大的传统对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信仰来接受的。而且即使是这一哲学本身的精髓也被一层又一层嚼之无味的常识和说教包裹着，要燃起热情的创造火焰，无论是对于整个哲学体系还是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等待一个伟大的解放运动的到来。

莫泊桑讲过，普通人一般极少去想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以及和世界

观有关的问题，只有当死亡来临或平静的生活中出现重大变故时，麻木的内心世界才会受到哲学和宗教的触动，但那时往往已为时太晚了。因此，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动对于一个老年人和正在成长的少年的心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正当我的思想趋于成熟，但还未成熟的关头，“文革”开始了。如果没有“文革”，或者“文革”推迟到十年以后发生，我都只可能是一个科学家，而不会走上思考历史、人生和哲学的道路。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北京大学化学系读书。当时越来越紧张的极“左”气氛在我心中引起不安和压抑，但我仍然不顾一切在读英文，埋头于科学报国的梦中。1966年盛夏的一天，因为我偷偷地躲在床上读英文，结果作为“白专典型”被同班同学批判。由于学习科学的权利从此被剥夺，我很快成为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

人们常常把“文革”时期的青年学生分成三类，一类是积极参与者——红卫兵，另一类是运动的对象——挨整者，第三类是逍遥派。按这种表面的分法，我属于二、三类。但我认为，不存在精神上的逍遥派，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文革”的参与者，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而我的参与方式很特别，一切事变在我的心中都变成了哲学。从此，我开始了那长达20年的哲学沉思——最初从陶醉在思想解放中的欢悦之情开始，接着就迎来了漫长的苦闷和彷徨时期，它包括那一次又一次在非理性主义的黑暗中探索，最后重新去寻找光明和理性的历程。

“文革”给我第一次内心的震动是那些我从小就被社会和家庭灌输的不可怀疑的信条的瓦解。从道德规范、理论体系、我所尊敬的人物一直到社会秩序，一切都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摇摇欲坠，原来那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也被亵渎了。我不知道这种大动荡对一个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影响是什么，但对我内心的影响却是十分怪异和理性的。虽然我的家庭以及我在运动中挨了整，但我并没有像一个正常、未经世

事的青年那样惊慌失措。相反，我从中领悟到怀疑一切的合理性。我好像从梦中惊醒，突然意识到以前不加怀疑就相信是一种混沌。当时，我的内心被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强烈地震撼了，我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中。

这种怀疑带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促使我用整个内心世界去感受辩证法。我开始领悟到辩证法的精髓。以前虽然我也学过辩证法哲学，但是对那些无处不在的革命性原理却视而不见，这就是：世界从本质上是发展的，没有一种事业、一种信条、一种规范可以万古长存。一切处于永恒的流动、变化、产生和灭亡之中。所谓辩证法的整个哲学体系无非是对这个伟大、简单但又十分深刻的原理的表述而已。

当时我的思想并不足以深刻到去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的古代哲学支柱“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信念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会被与其相反的观念——“万物是发展的”这一原理所取代？我至今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中道德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支柱正是关于天道悠悠万古不变的思想。要冲破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立足点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是可以想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之所以感到思想解放，归根到底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冲决了道德理想主义的堤坝。当时我还不可能清醒地意识到正是哲学给了我向传统道德理想主义挑战的勇气，我只是深深地被这一伟大的思想所激动，感到只做一个好人而不去洞察宇宙之真理是多么渺小！我想到了赫拉克里特被放逐的命运，黑格尔面临的那个大变动时代，一直到马克思对这一原理的正确阐述。我感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社会变化的急风暴雨；每十年中国社会的一次巨变，使得那些在民族苦难中寻找光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原理而接受了辩证法。而我无非只是这一系列先驱者的一个后继者。

总之，“文革”初期短短几个月，我所领悟到的超过了读几年书，我开始以一种崇敬的心情走进哲学的殿堂。当然最使我敬仰的还是马克思。他第一个在那苦难的深渊中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遗产，洞察

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放荡不羁，一边喝酒击剑并和同学斗殴，一边探讨真理的那种不怕神威、不怕天堂的雷霆的精神使我觉得振奋和解放。

任何一种解放，即使它的后果是导致虚无，其最初阶段都是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的。当时我心中雷声隐隐，自以为理解了辩证法的真谛，成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别人在写大字报，我却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来读马克思的原著，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一直追溯到黑格尔。由于我经常在和同学的讨论中诉诸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在一段时间里，我被朋友们称为“金格尔”。其实，当时只有20岁的我，除了对哲学和真理追求的满腔真诚以外，知识广度和理解深度是极为有限的。我只是被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大无畏的探索精神所鼓舞，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我心中的追求，它代表了我对思想解放的渴望。很快，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一样，狂热的理想主义的危机马上就来到了。

陷入黑格尔体系的泥潭

我认为，任何一种事业、运动，以至于社会形态的危机必然同时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而且思想深处的危机意识往往出现在现实危机之前。虽然我并没有投入“文革”运动，但我的整个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和“文革”时期的社会变迁连在一起的，差别仅在于这一切只发生在我心中。在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内心风驰电掣。但在别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对运动漠不关心的局外人。首先使我深入辩证法核心探索中去的是我对“文革”的迷惑。

直至今日，理论家仍不能对“文革”做出正确的解释。毫无疑问，“文革”是中国当代史上最痛苦也是最重大的事件。它是中国社会寻找现代化道路以及追求它自身理想所经受各种转变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事

件。作为处于当时革命中心地带——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又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我，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和把握这场运动。可我马上觉得自己所学的理论无能为力。一方面是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一个又一个的风云人物（包括理论家）倒了台；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在马克思主义和理想的旗帜下，一些类似于迷信一样的东西正在危险地蔓延。当时我的反应是和今天很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类似的：现实和理论之间总有一个不对头，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我发现，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大多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到运动中去，现实发展得太快了，他们又不得不用理论来理解并指导现实。结果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长期停留在原始状态。究竟理论基础是否扎实和正确，人们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

发现这一点后，我决心一定要把最基本的东西搞个清楚再往前走。如果基本东西不搞清楚，我宁可站在那里不走。为此，即使我远远脱离现实也在所不惜。我渴望着真正的理解，而厌恶那种一知半解和假理解！我和几个朋友曾用这样的话自勉：“不要怕我们走得慢，我们会走得更远！”当时我已经感到自己并不比先辈聪明多少，我唯一和他们不同的只是生活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有可能利用这个时代为我提供的新知识把一些基本问题看得更清一些。何况当时我已经目睹了我前面一批批人（实际上是一代人）的失败，我强烈地意识到决不能盲目地重蹈覆辙。

当时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希望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用自己真正领悟的（而不是从老师和书本中半懂不懂地听来、看来的）辩证法方法重新去考察人类文明史，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这会决定我在今后 20 年中最主要的工作，但无疑我已经看到，要理解今后中国向何处去，一定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我最初只

是想彻底学习马克思，真正理解并运用马克思成功地洞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当时我也并无太大的奢望，因为我丝毫不怀疑基本规律已被马克思发现，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演变的最终动力，我所想到的只是比马克思看得更仔细一点。我很快发现，要掌握这种方法必须去分析经典作家是怎样研究和解剖问题的。从反复推敲《资本论》第一章开始，我对这种方法有所领悟，接着我感到马克思在辩证法系统运用上直接继承了黑格尔。于是，我开始带着寻找方法的焦急心情进入了黑格尔哲学体系。

即使在今天，要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什么是货真价实的辩证法，指出它和为了考试而背诵的肤浅的辩证法有什么差异仍是困难的。但总的来说，凡对辩证法有造诣的人都承认，辩证地思考由两个基本环节组成，第一步是确定研究对象质的规定性，第二步是寻找这种质的规定的自我否定——所谓两重性。因为发展原理在辩证法中占核心地位，而发展原理最终只是强调任何事物在其本质上是内在地发展的，发展的动力和方式来自这个事物的内部，或者说来自这个事物之所以使其为这个事物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因此，为了理解发展思辨的辩证方法，第一步是寻找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一旦解剖了这种质的规定性，特别是阐明了其内在的否定方面以后，那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就自然呈现在你的面前了。长期以来，辩证法哲学把马克思对商品的两重性的解剖当作思辨分析的成功范例，但要模仿着运用同样的辩证思辨于其他例子却是十分困难的。什么是“物自身”？什么是某物之所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规定性？马克思讲得很少，而黑格尔却讲得很多。1967年的夏天十分炎热难熬。外面发生着武斗，而我却躺在竹床上反反复复苦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思索桌子、椅子、热水瓶的质的规定性开始，到思考人、自我、社会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今天看来，我的这种苦思冥想的思辨有些荒唐可笑。但这种深入黑格尔体系的辛苦的经历至今仍是我宝贵的财富。因为，如果没有切身的